

旅顺博物馆藏《春秋后语》(拟)研究*

刘子凡

内容摘要:旅顺博物馆藏LM20-1523-12-120号文书可推拟为《春秋后语》,与德藏Ch. 734《春秋后语》卢藏用注本在写本形态上十分相似。其中记载的“白起”、“帝号还”、“置南郡”等,皆为秦昭王事,极有可能是改编自《史记·穰侯列传》。其在《春秋后语》中的位置当是《秦语》第三。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春秋后语》写本,可以看到该书流行于唐代的大致情况。

关键词:旅顺博物馆 吐鲁番出土文书 《春秋后语》《史记》 白起 穰侯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很多古代典籍因时代之推移终遭散佚之厄。晋孔衍所著《春秋后语》自成书之后流布数百年,尤为唐代通行史籍,至宋元之后逐渐佚失^①。明清时屡有辑佚之作,然而所得有限。所幸敦煌文书中保存有数量众多的《春秋后语》写本,经罗振玉、向达、王重民等先生钩沉,使我们得见其大貌^②。目前所见较好的辑本有康世昌《〈春秋后语〉辑校》^③及王恒杰《春秋后语

* 本文系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即“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JJD770006)成果”]成果之一。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同项目诸位师友的多方帮助,尤其是荣新江、史睿二位先生的指导,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① 康世昌:《孔衍〈春秋后语〉试探》,《敦煌学》第13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114页。

②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中华书局影印上虞罗氏1913年印行本,2005年,第143-180页。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1939年新1卷第4期,第397页。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58年,第87-93页。

③ 康世昌:《〈春秋后语〉辑校(上)》,《敦煌学》第14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91-187页;《〈春秋后语〉辑校(下)》,《敦煌学》第15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第9-85页。

辑考》^①。两作之后,又陆续有新的《春秋后语》写本被比定出来。包括李际宁先生揭示的国家图书馆藏《春秋后语》(BD16645)残片^②,陆庆夫、陆离先生先后发现的俄藏敦煌文书中的五件写本 Дх2663、Дх2724、Дх341、Дх784、Дх11638,且可与英藏S. 713号文书直接缀合^③,还有郭丹女士发现的辽宁省博物馆藏残片^④。近来,法藏藏文本《春秋后语》亦经沈琛先生详细对勘,得到了更好的释读^⑤。更重要的是,荣新江先生发现德藏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春秋后语》(Ch. 734)残片,并将其比定为唐代卢藏用注本^⑥。由此可知在敦煌文献以外,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春秋后语》,这对于理解其在唐代的流布具有重要意义。在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中,又见有一件残片可推拟为《春秋后语》,且与德藏本相近,亦是弥足珍贵之重要写本,谨略作考释如下。

旅顺博物馆藏LM20-1523-12-120号文书(见图1),四边均残,仅存3行11字,楷书书写,字迹工整,且有界栏,“号”字后有朱笔句读。文书录文为:

- 1 []白起□[
- 2 []歸帝號還[
- 3 []鄧爲南郡[

郭富纯、王振芬先生刊布了这件文书,并将其归类为“其他文书”^⑦。遍寻现存典籍,确实无法找到与这件残片内容完全对应的文字。然而文书中所记之人物、事件,却又皆见于史籍。第1行中的“白起”为秦国名将,自不待言。第2行中的“帝号还”,应是指秦、齐归帝为王之事。《史记》卷五《秦本纪》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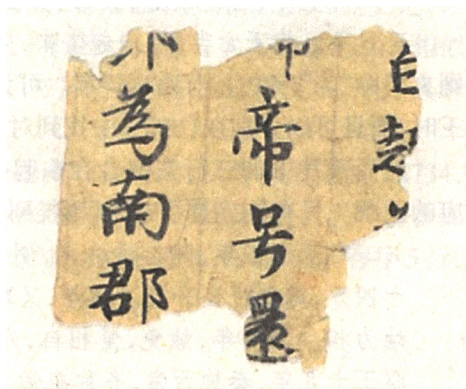


图1 旅顺博物馆藏LM20-1523-12-120号文书

①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齐鲁书社,1993年。

②李际宁:《〈春秋后语〉拾遗》,《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1996年,第335-338页。

③陆离:《俄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探识》,《文献》2001年第2期,第212-225页。陆庆夫、陆离:《俄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再探——对Дх.11638号与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号文书的缀合研究》,《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1-12页。

④郭丹:《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片再发现》,《文献》2013年第5期,第66-72页。

⑤沈琛:《P.t.1291号敦煌藏文写本〈春秋后语〉再研究》,《文献》2015年第5期,第69-89页。

⑥荣新江:《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注本残卷考释》,《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第71-73页。

⑦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万卷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

(秦昭王)十九年(前288),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①

又同书卷八三《鲁仲连列传》载:

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为急围赵者,前与齐愍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今齐愍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预未有所决。^②

这里也是说秦昭王与齐愍王争强称帝之事,但很快又同时放弃了帝的称号,而继续为王,即是所谓“归帝”。《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中的“月馀,复归帝为王”亦是如此^③。则文书残片中“帝”字上方之残笔应为“归”字。

第3行中的“为南郡”,则显然是指白起攻夺楚国郢之后,秦国以郢为南郡之事。《史记》卷五《秦本纪》载:

(秦昭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周君来。

王与楚王会襄陵。白起为武安君。^④

又同书卷七三《白起列传》载:

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⑤

则文书中“为”字之上当为“郢”字。可见,文书残片中所见两事,皆发生在秦昭王时,而且可以分别在《史记》中找到对应的记载。

然而残片中的三行文字合在一起的话,却无法在存世典籍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记载。只有《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中的内容与此类似:

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明年,又取楚之宛、叶。魏冉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其明年,烛免,复相冉,乃封魏冉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馀,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魏冉复相秦,六岁而免。免二岁,复相秦。四岁,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⑥

穰侯魏冉为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位高权重,是秦昭王时代最重要的外戚。此段便记载了魏冉举荐白起,以及几度入相的经历。文中先记魏冉荐举白起攻破韩、魏等国,再录秦、齐称帝复归帝之事,紧接着就是白起拔郢及秦置南郡事。从记事顺序看,与旅博残片所载正相合。而在《史记》中,也只有在《穰侯

①《史记》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212页。

②《史记》卷八三,第2459-2460页。

③《史记》卷四〇,第1729页。

④《史记》卷五,第213页。

⑤《史记》卷七三,第2331页。

⑥《史记》卷七二,第2325页。

列传》里,相隔数年的秦昭王归帝与秦置南郡之事会连在一起叙述。只是《穰侯列传》与文书残片中的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且文字显然更多。故颇疑旅博文书中的文字是删改自《史记·穰侯列传》。

这种似《史记》而非的特性,是《春秋后语》的一大特点。唐代刘知幾《史通》载: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①

可知,孔衍所作《春秋后语》是根据《战国策》和《史记》删改而来。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相关写本,可以清楚地看到《春秋后语》确实如刘知幾所言,参考了《战国策》分国记述的体例,分为《秦语》、《赵语》、《韩语》、《魏语》、《楚语》、《齐语》、《燕语》,合为十卷。然而与《战国策》不同的是,《春秋后语》参考了《史记》等书的纪年,每一国语中皆是以编年的形式记述。全书绝大部分内容也确实依据《战国策》和《史记》两书删补而成,兼采他书。孔衍选取的《史记》段落,都进行过删改,以致我们今日所见很多《春秋后语》写本文字与《史记》相似而又略有出入。旅博所藏关于“帝号还”与“郢为南郡”的这件文书,刚好具有这样的特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旅博文书与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Ch.734,见图2)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德藏《春秋后语》残片,为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所得,具体出土地点不详。残片大小为8.8×8.8厘米,四边均残,存字5行,书写极为工整,兼有小字注。录文如下:

- 1]穰侯也言秦王之卒
死豈無人殺戰哉商君_不]
- 2]告商君反吏捕之商君[
- 3]君之法舍人無驗者[
- 4]_走無所歸還入其邑[
- 5]國以五車各繫其首
繫之或謂之國
- 6]□□[

经荣新江先生考证,残片中大字正文的部分与法藏敦煌写本P.5523、P.5034《春秋后语》卷一《秦语》上的相关文字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确定此件为《春秋后语》写本残片。同时,文书中的注文从用语、内容、形式上看,都与辑本中的卢藏用注十分类似,而与敦煌所出“释文本”不同,则又可以判定其为卢藏用注本^②。这也是此前唯一可以确知的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出土文书中的卢藏用注本亦仅此一件。

①刘知幾:《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②荣新江:《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注本残卷考释》,《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第71-72页。



图2 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Ch.734)

如果仔细比对旅博LM20-1523-12-120文书与这件德藏《春秋后语》残片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相似性。二者都是用楷书写成的精抄本,字迹十分工整,其抄写的严谨程度显然要超出敦煌所出的各件《春秋后语》。细审之下,还可以发现二者的笔迹十分接近,从字体结构及用笔上看,都有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两件文书皆有乌丝界栏。经测量,旅博文书的界栏宽度为1.4厘米,单字的宽度大致为0.7-0.8厘米。根据IDP刊布的附有比例尺的德藏文书照片,其界栏宽度为1.4-1.5厘米,单字的宽度亦为0.7-0.8厘米。二者完全相仿。但需要注意的是,旅博文书有一处明显的朱笔句读,而德藏《春秋后语》应断句之处皆似有句读,但并不明显。细审IDP公布的彩色图版,德藏文书第2行“之”字,第3行“法”字、第5行注文“之”字右下角疑有极淡的小朱点,第4行“歸”字右下角疑有墨点,这与旅博文书的点断方式不太相同。由此我们似难将两件文书完全比定为同一写本。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旅博文书在写本形态上十分接近德藏吐鲁番出土的《春秋后语·秦语》卢藏用注本。

综合以上信息来看,旅博LM20-1523-12-120文书极有可能也是一件《春秋后语》。根据前文提到的秦、齐归帝为王及秦国置南郡的历史信息,以及文书叙事顺序与《穰侯列传》的相似性,可以进一步推测旅博文书为《春秋后语·秦语》。从敦煌所出《春秋后语》的情况看,《秦语》分为三卷,《秦语》第二结束于武王二年(前311),则秦昭王的部分当在《秦语》第三。

今存诸种《春秋后语》中,《秦语》第三大多是秦始皇以后的内容,仅辽宁省

博物馆藏《春秋后语》所记为昭王时事,可惜其中并不包括旅博文书中所记置南郡等诸事。不过这件辽宁省博物馆藏《春秋后语》的内容,与旅博文书虽不可直接对应,却前后关联。辽宁省博《春秋后语》存字28行,主要记述范雎与须贾之恩怨故事,涉及范雎化名张禄使秦,得到秦昭王重用拜为秦相,羞辱须贾之事^①。文书最后一句,则接叙穰侯之事,其文曰“穰侯之废也,宣太后忧病而”云云。实际上,穰侯被废正是与范雎有关。《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载: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于是魏人范雎自谓张禄先生,讥穰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以此时奸说秦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多,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②

可见,范雎之获得重用,正因讥穰侯伐齐。穰侯免相国,导火索也是范雎进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故而,《春秋后语·秦语》在范雎事后,接叙穰侯之废云云。至少可以肯定,《春秋后语·秦语》有关于穰侯之记述。旅博文书中所记有关白起、还帝号、置南郡之事,正处在穰侯势力最盛之时,与辽宁省博文书所记范雎拜相和穰侯之废前后呼应。综合各种因素,可以判断旅博LM20-1523-12-120文书为《春秋后语·秦语》断片,可补《秦语》第三之缺。

二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大量《春秋后语》残片,尤其是旅博LM20-1523-12-120号文书及德藏Ch. 734号文书这两件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的发现,对于我们理解该书在唐代的流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书写上看,吐鲁番出土的旅博藏《春秋后语》及德藏卢藏用注本无疑都是精抄本,不仅书写极为工整,而且打有界栏。这种精致的写本在吐鲁番出土的非佛经类写本中并不常见。在写本时代,文本的抄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只有《论语》、《毛诗》一类的重要典籍,才会被如此严谨规范地抄写。从这个方面来说,吐鲁番所见《春秋后语》尤其是卢藏用注本,应当是被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要典籍来抄写的。甚至可以说,《春秋后语》卢藏用注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其在唐朝的经典化。《新唐书·艺文志》载有“卢藏用《春秋后语》十卷”^③,《荀子》唐代杨倞注,亦见有引用《春秋后语》卢藏用注^④。可知卢藏用注本或为唐代较为通行之《春秋后语》版本。

不过从敦煌写本来看,《春秋后语》在唐代流布的注本并不只此一种。英藏S. 1439文书便是一种仅有释文的《春秋后语》,被称为“释文本”。其内容是

①郭丹:《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片再发现》,《文献》2013年第5期,第68-69页。

②《史记》卷七二,第2329页。

③《新唐书》卷五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1440页。

④《荀子》卷九《君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第76页。

摘录《春秋后语》本文中需要注释的字句,逐一注释。此种释文明显与卢藏用注本不同,为另一系统的注本^①。这种“释文本”显然是作为阅读正文的工具来使用,这种独立的工具书的出现,恰恰可以显示出《春秋后语》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阅读的书籍。敦煌吐鲁番写本中发现这么多的《春秋后语》,本身也可以说明其在当时社会上的流行程度。虽然《春秋后语》的主体是摘自《战国策》和《史记》,但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史记》写本却远没有《春秋后语》这样多^②,《战国策》则更是尚未发现。《春秋后语》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同样,在史籍中也可以找到《春秋后语》流行于唐代的相关信息。刘知幾《史通》在记述“《国语》家”时,用了最大的篇幅来探讨《春秋后语》。除上文引用的一段之外,其文又有:

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③

可知孔衍尚撰有《春秋时国语》,大致是记录春秋时代的史事,但在唐代已不可见。至于《春秋后语》,则因孔衍自序中说到“虽左氏莫能加”,而遭到世人之讥讽。但刘知幾认为,孔衍所指为左丘明所撰《国语》,而非《左传》,以《春秋后语》比《国语》则不足嗤。这是对《春秋后语》的肯定,我们同样也可以从中读出“世人”对于《春秋后语》具有普遍认知。又柳宗元《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有: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驳乱,《尚书》、《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传孔氏,太史公述历古今,合而为《史》,迄于今交错相纠,莫能离其说。独《左氏》、《国语》纪言,不参于事。《战国策》、《春秋后语》颇本右史《尚书》之制。然无古圣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数耗矣,而后之文者宠之。^④

在这里,柳宗元是将《春秋后语》与《战国策》并举,列为右史《尚书》系统的重要史籍。在柳宗元的叙述语境中,《春秋后语》俨然与《左传》、《国语》等书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虽然柳宗元是以批评为主,但还是可以看到“后之文者”喜读《春秋后语》之情形。

唐人的各种著作中,也多有引用《春秋后语》者。如徐坚《初学记》、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类书都引用过《春秋后语》。对后世影响甚大的胡曾《咏史诗》中,有十馀首诗的注文都大量抄录《春秋后语》。据赵望秦先生考证,此为晚唐人陈盖所注^⑤。甚至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亦引用到《春秋后

①康世昌:《孔衍〈春秋后语〉试探》,《敦煌学》第13辑,第117-119页。

②参见张宗品:《从古写本看汉唐时期〈史记〉在西域的传播——中古时期典籍阅读现象之一侧面》,《古文献研究》第17辑上卷,2014年,第76-84页。

③刘知幾:《史通》,第14页。

④《柳宗元集》卷二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576页。

⑤赵望秦:《胡曾〈咏史诗〉注本考索》,《中华文史论丛》第75辑,2004年,第220页。

语》，其书卷一六“河南道·太原府·晋阳县”下有：

《史记》云：“智伯攻襄子于晋阳，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春秋后语》云：“智伯攻晋阳，决晋水灌之，城中悬釜而炊。”今按，城东有汾水南流城西，又有晋水入城，而《史记》云引汾水，《后语》云决晋水，二家不同，未详孰是。^①

是又将《史记》、《春秋后语》对举，同样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而两存之。总之，无论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的大量写本残片，还是唐人著述中的众多记载来看，目前已散佚的《春秋后语》在唐代确实是十分流行的重要典籍。

《春秋后语》采择《史记》、《战国策》而成，卷帙较小，又囊括两书之精华。故在写本时代，《春秋后语》更便于流传^②。实际上，魏晋隋唐之际，改编史书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新唐书·艺文志》载：“《东殿新书》二百卷，许敬宗、李义府奉诏于武德内殿修撰。其书自《史记》至《晋书》删其繁辞。龙朔元年上，高宗制序。”^③此《东殿新书》与《春秋后语》类似，也是删削史籍而成。不过宋代以后，此类著作的功用逐渐被其他相关图书替代，学者也更加重视原典，《春秋后语》等书也就逐渐散佚了^④。

总之，旅顺博物馆藏 LM20-1523-12-120 号文书可推拟为《春秋后语》，且与德藏 Ch. 734《春秋后语》卢藏用注本在写本形态上十分相似。其中记载的“白起”、“帝号还”、“置南郡”等，皆为秦昭王事，极有可能是改编自《史记·穰侯列传》。而其在《春秋后语》中的位置当是在《秦语》第三。此亦吐鲁番文书中之珍品，使我们得窥《春秋后语》流行于唐代之一斑。

【作者简介】刘子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敦煌吐鲁番学、隋唐史。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中华书局，1983年，第365页。

②参见康世昌：《孔衍〈春秋后语〉试探》，《敦煌学》第13辑，第115页。

③《新唐书》卷五九，第1543页。

④参见张宗品：《从古写本看汉唐时期〈史记〉在西域的传播——中古时期典籍阅读现象之一侧面》，《古文献研究》第17辑上卷，第91-92页。